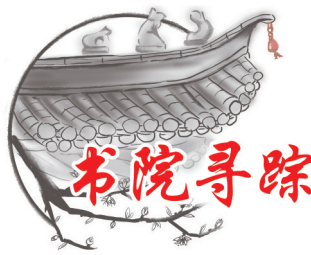


『浙学源头』重要标识地——丽泽书院

□ 陈旭东



之畔（今通济桥东北）。1279年南宋灭亡后，丽泽书院由何基弟子金履祥司讲。元三十一年（1294年），官府重修丽泽书院，由王龙泽撰《修丽泽书院记》勒于石；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书院毁于大火，至元年间（1335—1340年）曾重建，元末又毁。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吕氏后裔重建书院。明成化三年（1467年），浙江都指挥使司军事辛访命金华知府李嗣重修，魏骥撰《重修丽泽书院碑记》。嘉靖十四年（1536年）巡按御史张景命金华府通判汪昉重修丽泽书院，供祀“东南三贤”，戚雄撰《重修丽泽书院记》。至明末，丽泽书院终因遭兵燹而毁。至此，丽泽书院存478年，其间共毁建达30余次。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金华知府张坦让建丽正书院，乃合丽泽书院、崇正书院“两名于一而得”，其用心为使丽泽遗风一脉相传。乾隆年间之后，金华历任知府郑远、杨志道、凌广赤、吴廷琛曾相继对丽正书院进行了整修、改建，最兴盛时有五进三楹正房15间，两边层各26间，并配有300亩学田和粮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知府爱新觉罗·继良按清廷“废书院、兴学堂”之谕令，改丽正书院为金华中学堂（第二年改称金华府中学堂），校址在金华市市区东岳宫与八婺公所之间，成为婺江之东、长山之阳广袤八婺大地上的一桩大盛事。1912年金华府中学堂改称“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校”，至1922年更名为“浙江省立金华中学”。至此，丽泽书院转型为新式学校。

（三）

南宋时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是发达于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派之先导。其中金华学派、永康学派因地望关系统称为“婺学”（金华古称婺州）。历史上婺学形成两次引领全国的高峰，其最主要的学术基地都在丽泽书院。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从福建回金华丽泽书院途中，为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双方思想理论分歧，在江西鹅湖寺展开了一次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辩论会——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朱熹、吕祖谦两人合作编撰《近思录》，朱熹还把儿子朱塾送到丽泽书院求学。朱熹与吕祖谦私信往来频繁，两人四度聚会切磋学术。婺学的第二次高峰也与丽泽书院密切相关。元末明初的“北山四先生”先后都担任过丽泽书院山长，既得朱熹理学真传，又得吕学精髓，致力于传承程朱理学。

正是丽泽书院这种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的学术和教育风格，催生了一代代人才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

（四）

丽泽书院及其文化影响，首先及于浙东的宁波、绍兴、温州、台州等地的学者，浙东地区不少名儒都出自丽泽书院名儒门下或间接受其影响。如宁波地区的黄震、王应麟、袁桷可谓“得吕学之大宗”者。黄宗羲其史学名著《明夷待访录》也受吕祖谦思想影响。特别是承袭湖学之学的全祖望，对婺学十分推崇。清代浙东学术大师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实际上点明了丽泽书院在整个浙东学术中实乃为策源地。

丽泽书院的影响逐步推广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北、江苏、河北以及齐鲁大地。如丽泽书院有不少福建生徒，他们学成后都在福建传播东莱之学。受吕祖谦创建丽泽书院影响，宋、明、清三朝又出现了10余所“丽泽书院”，分布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甘肃等省。另外，《中国书院史》中有记载的金华书院47座，《浙江通史》中有记载的金华书院30余座，均名列浙江第一、全国前列。从中可以看出，丽泽书院对后世教育尤其是中国书院产生了很大影响。

丽泽书院和历代浙东学派诸位儒学大师均主张研究历史与实际相结合，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这些观念对海外华人的经商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金华市正加快推进丽泽书院建设，努力打造“浙学之源”重要文化标识地。

在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构成中，仁是一个根本因素，在“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君子之道中，仁具有优先地位。那么，仁者为何能够达至“不忧”的心理状态呢？

内省不疚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不解：不忧不惧，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吗？孔子回答：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朱熹解释说：君子平日为人处世光明正大，坦坦荡荡，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所以在内省时能做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自然能不忧不惧。

“内省不疚”，即是“心安”。在孔子与宰予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中，便显示出人之“仁”或“不仁”的主观基础或判断标准，就是“心安”。面对宰予对“三年之丧”的质疑，孔子的回应十分简约：“于女安乎？”丝毫不究其他，而是直指其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人世间的的事情，无论如何困难或复杂，始终有一真实而简单的依据，那就是心安与不安。所作所为若在自己之心能无愧于人、无愧于己而安，便是事情能够真正推动延续下去的根本原因。否则，这种行为便值得怀疑与商榷。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力主展现真实、可信、可亲的自我，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将那种虚情假意、伪善欺世之人斥为“乡愿”，认为他们是道德败坏的小人。孔子本人爱

（上接1版）一是扎紧织密制度笼子，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制度，提升管权治吏效能，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减少决策和执行失误。同时以严明纪律保证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习惯在受监督有约束的环境里工作生活。二是把牢不可逾越的党纪国法红线底线，科学看待党员干部改革探索中出现的失误错误，区分是“为公”还是“谋私”，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是法规制度明令禁止的还是保护探索创新可以免责的。既防止打着改革旗号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不顾实际的所谓“创新”，又鼓励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改善民生福祉中提升素质、增强本领。三是立足大局全局，紧盯重点难点、“关键少数”，完善风险研判机制，形成容错纠错的科学标准和有效路径。同时高度警惕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坚决铲除风腐一体的土壤和条件。四是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纪法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

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准。发挥纪律建设治本作用，要遵循党章，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高线引导和底线约束相统一，将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一是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监督执纪执法有形有效的全覆盖。以严明政治纪律带动六大纪律全面从严，让铁纪“长牙”发威，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二是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把纪律贯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全过程各方面，做到体系化推进纪律建设、制度化完善纪律规范、规范化执行党的纪律。三是纪检监察机关要锚定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能

仁者何以不忧

□ 李素英

憎分明，喜怒哀乐形之于色；对于以木偶人殉葬的反人道行为，他破口大骂；对于颜渊英年早逝，他悲痛欲绝；对于知天命之年被委以重任，他喜不自禁……种种记载，将孔子丰富的情感世界展现于世人面前。可见，从情感角度来讲，君子应当是具有真实道德情感的大爱之人。

孟子将“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视为君子三乐中的第二乐，很明显，这是一种道德之乐。人的行事皆由诚而发，无愧于天、地、人、我，此时的快乐便是“乐莫大焉”，这种道德情感便是最高的愉悦之情。

欣然爱人

孔子以“爱人”来定义“仁”。董仲舒认为，仁者之“爱”是爱他人而非爱自己。这种“爱人”的品德为人本身所具有。《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仁”是人的内在本质。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观点，为仁爱思想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他之所以坚持人性善，是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体悟到的：当突然看到懵懂无知孩童将要掉入井里时，任何人都会产生惊恐悲伤之情，而这并非出自功利性的利害考量、名誉算计，而是自然流露出的源自内心本然善心善意的悲悯之情。孟子认为，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也是道德的根源。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由感情开始的，而这种感情又生于人的本性。所以，“仁”作为道德意识，首先要爱亲，从爱自己的

定位，通过加强纪律建设和纪检工作，管住纪律、看住权力，使干部向高标准努力，不犯或少犯错误，坚决避免犯严重错误。四是加强纪律教育。深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党员干部涵养廉洁文化，加强政德建设，提升党性觉悟和纪法意识，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形成自觉的纪律，真正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有效推进纪法贯通，激励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必须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实现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无缝对接，使党的先进性要求融入权力运行全过程，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好。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进一步维护党章权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以有力有效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干事创业。一是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健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强化对权力和责任的监督，使监督融入日常变为经常，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行。二是进一步明确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行使权力慎之又慎，自我约束严之又严。明确党员干部敢于作为、善于作为、主动作为和克服不作为、不敢为甚至乱作为都是执纪监督的重点。三是强化监督的约束和激励功能。积极推进“四项监督”协调联动，更好实现纪检监察监督与巡视监督、审计监督的衔接，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前移防线、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保护爱护干部统一起来，把督促党员干部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同激励他们抓改革、搞创新、提效率统一起来，确保党员权利义务落在实处。

父母兄弟做起。孟子提出，亲亲即是仁，敬长即是义，仁义便在人人皆有的家庭伦常中得到了表现。而能够做到以事亲之孝和从兄之悌的实践为“乐”，在孟子看来，是最为根本的一种快乐。所以，他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放在君子三乐的首位。

这种快乐的道德情感是无穷的，所以“仁”的精神就不能也不会仅仅停留在爱自己亲人的家庭层面。孔子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明确提出要把施爱对象从家人向大众过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从事亲、从兄的孝悌之行做起，将个人之爱拓展至其他社会成员，自然会构建出和谐友爱、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自发性的道德实践中，感受着人际交往中的爱与敬以及相伴而来的快乐，仁者当然不忧。

乐天知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将“知命”视为成就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周易》中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里的“命”主要是指一种人力无法决定与掌控的客观限制，而“天”则主要指道德之天，它是人类道德的根源。

何谓“知命”？人生在世，生命有限而易失，不仅个体立德、立功、立言的事业必然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也难以遇到吉凶、祸福、得失、荣辱

不断完善“三个区分开来”的体制机制

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三个区分开来”的适用对象覆盖所有党员，就是要求更好落实政治责任，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纯洁党的队伍，在全党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一是坚持好干部标准，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党的各级组织和职能部门要积极推进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体制机制建设，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二是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细化实化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制度规章，用好数据统计功能。既大力选拔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又宽容在先行先试、推进改革中出现失误错误的干部，大胆培养使用。三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通过科学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出对策，减少决策失误和执行偏差。聚力解决“四个不纯”和“四风”隐形变异问题，鼓足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神气。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科学运行的容错纠错机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现，能够为敢闯敢试的好干部撑腰鼓劲，形成解放思想、迎难而上、务实进取、守正创新的政治环境。容错容的是先行先试、探索性试验、推进发展的失误错误，目的是鼓励创新，使组织敢担当，干部有底气，敢于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纠错的本质是确保理想信念不移、改革目标不变、发展方向不偏，满足的是人民群众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期待。一是完善“三个区分开来”的制度规范和措施办法，明晰容错的政策底线和纪法尺度；科学把握责任清单和免责清单，完善容错纠错的标准程序、保障机制，细化容错

等命运的困扰。当年孔子及其弟子受困于陈、蔡之间，子路就不理解为何夫子“累累、积义、怀美”却身处困境。孔子认为，君子必须要正视并接受自身所处境遇，即“知命”。只有这样，才可以消解因吉凶、祸福、顺逆、穷达等带来的种种困扰。

何谓“乐天”？天有道，而人最为灵秀，所以天道需要由人来体现。“天生德于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认为人的德性是上天赋予的，只要修德践仁便可上达天道。因此，君子应了解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以践行上天赋予的德性品质为乐，即“乐天”。以颜回为例，他乐居于人不堪其忧的陋巷中，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清苦生活，是因为他有着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精神道德选择，所以孔子赞其“贤哉”。

君子乐天知命，所以无论境况如何，都能安之若素，无所忧虑。孟子说，为死者而哭的悲哀，不是做给生者看的。依德而行不违礼制，不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言语一定信实，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行为端正。就是说，君子立身处世，只是行其当行，为其当为。

儒家先哲借助“仁者不忧”这一论断，为世俗人生构建出高远宏大的生活意义和相应的精神境界，树立起儒家君子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丰富了君子的价值内涵。



情形、优化容错流程，坚持容错纠错并举，使党员干部既敢于创新、敢于担责，又慎独慎权、行有所止。二是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立足两个大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精神和专业能力，确保党内法规体系刚性运行。三是推动党内监督向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的具体环节延伸，丰富监督执纪执法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方法，使严管厚爱的要求更为扎实，使教育、管理、监督更加具体。同时使党员干部敢于走出舒适区，更加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保全党高度团结统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强化问责追责机制。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专责，更好履行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深入分析党员干部中出现的精神懈怠、消极躺平、为官不为或乱作为等问题原因，正确分析研判错误性质，找准问题根源，在厘清相关责任、问题性质、情节后果基础上精准运用纪法标准追责问责。坚持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加大对不担当不作为干部的问力度，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敢于和善于让干部在事上磨事上练，通过在艰苦条件下的磨砺，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让投机钻营者无机可乘。同时及时甄别不实举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做好澄清正名，让干事者不受委屈，让改革者不背包袱。

实事求是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紧紧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思想引导和制度约束相结合，用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使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以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力，锻造过硬本领。同时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主线，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核心要义，既完善权力监督，又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在狠抓落实中实现发展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新提升。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